

朱健华 著

中国近代报刊 活动家传论

贵州民族出版社

朱健华 著

中国近代报刊活动家传论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 彦 君

封面设计 王 剑

中国近代报刊活动家传论

朱健华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 289 路号 邮码:550001)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3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册

ISBN 7-5412-0760-8/K·60 定价:19.50 元

目 录

林则徐	(1)
王 韬	(8)
伍廷芳	(18)
郑观应	(21)
陈 虬	(28)
宋 恕	(33)
严 复	(36)
吴趼人	(45)
康有为	(48)
梁启超	(70)
汪康年	(106)
欧榘甲	(111)
徐 勤	(117)
麦孟华	(121)
谭嗣同	(128)
唐才常	(136)
樊 锥	(143)
郑贯公	(147)
孙中山	(151)
陈少白	(170)
陈天华	(181)
李宝嘉	(188)
陈 范	(191)
章士钊	(198)

章炳麟	(208)
廖仲恺	(225)
胡汉民	(233)
宋教仁	(246)
刘师培	(254)
鲁 迅	(260)
蔡元培	(273)
秋 瑾	(296)
于右任	(303)
史量才	(316)
朱执信	(321)
林 獬	(327)
詹大悲	(334)
黄 侃	(340)
胡石庵	(344)
柳亚子	(348)
英 华	(353)
彭诒孙	(358)
黄远生	(365)
邵飘萍	(374)
李大钊	(384)
陈独秀	(404)

主要参考文献	(416)
--------	---------

林则徐

(1785 — 1850)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1785年8月30日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林万选，父亲林宾日(字孟养)都是“皓首穷经”、热衷于科场的人，却最终只有个秀才的头衔。其父以教私塾为生，把入仕成名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林则徐出生时，恰有福建巡抚徐嗣曾“鸣驺过其门”，其父喜出望外，认为是大吉之兆，此子日后定可成就功名，光宗耀祖。林则徐刚满3岁，便被父亲抱入私塾，授以四书五经。

林则徐确也不负父望。他聪颖好学，13岁那年(1797年)即通过府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19岁时，他又顺利通过乡试，中了举人。此后，林则徐一面继续读书，一面为解决生计，先后当过教书先生、厦门海防同知衙门司书、福建巡抚幕僚等，对社会现状、朝廷政令等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沿海十分猖獗的鸦片走私，和中国人因吸食鸦片而致身体和精神被严重摧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逐渐萌发了改革现状的思想。

1811年，林则徐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从此步入仕途。3年后授翰林院编修。1816年后，历任江西乡试副考官和云南乡试正考官。1820年后，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

道、江苏和陕西等省按察使、江宁与湖北及河南等省布政使等职。1831年冬任东河河道总督。1832年任江苏巡抚。1837年任湖广总督。

在翰林院供职的近十年中，林则徐潜心“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之学”，通览历代典籍、当代谕旨、奏折，并接触到京师内外秘闻、各地奏报，对清王朝的种种积弊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决心兴利除弊，希望改革内政，重振华夏。

由翰林院出任地方官后，林则徐深知仕途艰难，但他以中国历代忠臣良将为楷模，决心“龟勉勤职守，首祈吏安民”。他为官确实清廉自守，秉公徇法。每到一地，即严整吏治，平反冤狱，兴修水利，放赈救灾，发展农业，扶助工商，办了不少于国于民有益的事。

当此之时，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飞扬跋扈、疯狂扩张相对应的，是中国封建社会衰颓之势日渐加剧。在商品输出遭到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的抵制后，西方列强便以鸦片走私为武器，挤进中国，掠夺与毒害双管齐下，造成中国白银外流，财源枯竭，风气日坏，民不聊生。于是，在清朝统治集团内爆发了对鸦片“弛禁”还是“严禁”的论争。

对鸦片走私造成的恶果早已深恶痛绝的林则徐，当时正在湖广总督任上。他已经在管辖范围内实施禁烟措施：在武汉、长沙等地设立禁烟局，收缴烟土、烟具，严惩烟贩和烟馆老板，并配制、推广戒烟药，令吸食鸦片者限期戒绝。当1838年6月清廷将鸿胪寺卿黄爵滋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交各地将军、督抚“各抒己见”时，林则徐立即上疏，支持严禁烟片，并在其后上奏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中，撇开一般人以鸦片之害在败坏民风的陈旧观点，从社会经济这一根本问题入手，痛陈鸦片走私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危害，并发出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些振聋发聩的议论，终于使道光帝决定采纳严禁鸦片的主张，于

是召林则徐晋京陛见，八次与之讨论禁烟大计，最后在 1838 年底委以钦差重任，令其赴广州查禁鸦片。

1839 年 2 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在采取一系列毫不妥协的禁烟措施的同时，组织有关人员，从当时收集到的外文报刊上，选译出一部分新闻和评论，编成《澳门新闻纸》。“新闻纸”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国报纸的称谓。据今人考察，当时《澳门新闻纸》的主要信息，大多由英国商人主办、在华出版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上译来。

《澳门新闻纸》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官方报纸，受中国古代报纸的影响，它又是一份带参考资料性质的内部报纸。它译编的内容主要包括：关于英、美鸦片贩子如何贿赂清政府官员使之私自放行的记载；关于印度出产鸦片及贩运到中国的情况；关于清政府的禁烟措施及烟片被收缴的情况；对林则徐的禁烟行动的评论；关于英国鸦片贩子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之间讨论如何对抗中国政府的禁烟措施的记载；关于各国鸦片贩子要求英、法、美政府出兵向中国示威的叫嚣；关于英国等各国报纸上干涉中国禁烟的正义行动、鼓吹发动侵华战争的言论；关于沙俄迅速向南亚扩张并威胁中国西部边疆的情况；等等。

林则徐又根据《澳门新闻纸》上的零散材料，按专题分别整理加工，辑成《澳门月报》，其内容分别为：外国（主要是英、美、印度、孟加拉、沙俄、阿富汗等国）地理、历史等情况介绍，外国舆论对中国禁烟运动的反映，外国报刊对中国社会状况以及禁烟运动、茶叶贸易、兵事等的评论。后来，在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中收入了《论中国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新闻纸》、《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篇章。林则徐还从《澳门月报》中选取了一些内容，附在奏章里上呈道光皇帝。

《澳门新闻纸》的译编时间，起于 1839 年 3 月，迄于 1840 年 11 月，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应召在林则徐幕中参加翻译、编

辑工作中的人中，现在可考的有袁德辉、梁进德二人。袁德辉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创办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1839年到广州入林则徐幕，担任译员，是《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所刊资料的主要翻译者之一。梁进德，一个年轻人，其父梁亚发是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报馆的雇员，他本人则在美国传教士家中生活了8年，因此也被林则徐访到，召去做了正式译员。

这一时期，林则徐除了组织译编《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外，还根据外国人撰写的书籍辑译了《华事夷言》（译自英人德庇时的《中国人》一书）、《各国律例》（译自瑞士人滑达尔的《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与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的原则》一书）、《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译自英人地尔洼同名小册子）、《四洲志》（译自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稿，以及有关火炮制造和操作的资料。

1840年10月，林则徐被革职，幕僚纷纷遣散，译编《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的活动也就被迫停止了。

林则徐组织译编《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首先是出于禁烟运动亦即反侵略斗争的需要。

当时的世界情势，是资本主义各国正积极扩张势力、开拓市场、占领和掠夺殖民地，而封建、古老、闭塞的中华帝国却积弊丛生、没落衰微，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殖民主义者们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运用野蛮的掠夺手段，远涉重洋，在全世界寻找可供攫取的财富，而疆土辽阔、民众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觊觎的一块肥肉、一片宝地。当他们的资本主义商品输出遭到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抵制后，他们不惜采取鸦片走私等卑劣手段，掠夺中国财富，毒害中国人民。

在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对鸦片走私的危害深感忧虑，深恶痛绝，他们通过力争，终于使禁烟的主张得到皇帝认可并付诸实施。林则徐成为这场禁烟运动的

实施者和指挥者。

为了取得禁烟运动的成功,就要同外国殖民者进行外交的甚至军事的斗争;要想在这些斗争中取胜,就必须了解外国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当时的大清官吏,大多是些庸碌之辈,对中国面临的危局尚且懵然不觉,对外国的情况能有什么了解呢?诚如林则徐所说:“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因此,他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其实,即使是林则徐这样比较清醒的大臣,在亲临禁烟斗争最前线——广东沿海之前,对外国的情况亦知之甚少,故而在力主禁烟时将烟毒泛滥的主要罪责归之于吸食者,提出“必以重治吸食为先”,认为禁吸食即可杜弊端,把禁烟的着眼点放在国内。他初到广州时,也还盲目地认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而外国如果得不到中国的茶叶、大黄,“即无以为命”。但是,林则徐是一个善于学习、积极进取的人,在禁烟运动的实践中,他很快意识到了了解外国情况对禁烟运动的成败至关重要,于是决定组织人员“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进行选译、编辑。林则徐在1839年3月致广东巡抚怡良的函中,就说明自己正组织译编《澳门新闻纸》,“借以采访夷情”。显然,了解参与鸦片走私的英、美等国的情况,以定制胜之策,是林则徐组织译编外国书报的初衷。《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和《各国律例》的主要内容,也都与鸦片走私、战争、封锁等有关,正说明林则徐收集、翻译、编辑这些材料的目的,首先是为禁烟斗争提供参考、直接服务的。

但是,林则徐在译编《澳门新闻纸》等的过程中,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译编内容也不完全限于与禁烟有关的资料。例如:《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上,都有相当篇幅是关于沙俄对外扩张的情况。1840年7月25日编辑的《澳门新闻纸》上有一段关于沙俄企图南下与英国殖民者争夺阿富汗和土耳其的报道。林则徐在这

段译文后面加了一段按语,说明自己根据这篇报道复核了6幅有关地图,又查阅了有关地理书籍,考察出沙俄可经两条路线攻取阿富汗,然后南下印度,进而可威胁我国的西藏。

由此可见,林则徐通过译编《澳门新闻纸》,不仅掌握了与禁烟运动直接相关的英、美等国的大量情况,而且了解了与鸦片走私无关的沙俄的扩张动向,并引起了他对西部边防的关注。这样,林则徐出于禁烟的需要译编《澳门新闻纸》,而译编《澳门新闻纸》却使他目光越出了最初预想的范围,看到了更为广阔、辽远的世界。这一观察面的扩大,使他有可能在更广的空间、更高的层面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在认识上产生飞跃:由为了禁烟而采访夷情,上升为为了改变中国现状而了解世界、学习西方。

正是这一认识的飞跃,促使林则徐在领导禁烟斗争的繁忙事务中,始终抓紧译编外文书报活动,不断扩大编译范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辑译了包括各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军事技术、法律等丰富内容的资料。即使是在革职之后,他还将《四洲志》译稿悉数交付挚友魏源,嘱其撰成《海国图志》刊行于世,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情况。

林则徐译编《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等的活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是极其大胆的行为,他的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认识和实践,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那种封闭、愚昧、麻木、妄自尊大与怯懦软弱并存的思想氛围中,林则徐这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认识和举动,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它标志一个古老帝国的机体内部,开始萌发出一种崭新的、可能取而代之的生命。它虽然还是星星之火,但由于它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林则徐以封建王朝钦差大臣的身份,却公然聚集幕僚、随员,翻译、编辑“夷人”的书报,探求外夷的“奇技淫巧”,甚至购买洋人的舰船大

炮,这不能不说是封建传统、封建体制的违逆,没有足够的见识和勇气是做不到的!这正说明,林则徐是站在那个时代巅峰的人物,其思想认识水平已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人们。他所译编的这些宝贵资料,不仅对当时制定抗击英殖民主义者侵略和预见沙俄的侵略野心方面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正是从林则徐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实践中获得了认识的素材,维新变法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康有为,曾不无敬意地提到“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显然,维新派大量创办报刊、出版书籍鼓吹学习西方的活动,也是从林则徐那里有所继承的。因此,可以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探求真理的活动,都是以林则徐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的;林则徐勇于向“外夷”探求新知的行为,发展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传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确认:“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毛泽东同志更指出:“我们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将林则徐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起点人物,这些评价实在并不过分。

诚然,林则徐译编的《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还不是严格意义的近代报刊,《华事夷言》、《各国律例》以及《四洲志》等书稿也都未曾刊行,但这不能不考虑到他的译编活动是在查禁鸦片、整饬武备、对外交涉等极为繁忙的一年多时间内进行的,更不能不考虑到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译编外国书报的大胆举动,而且林则徐早有将这些译编的资料刊行的意图,否则将如何解释他在赴戍途中将《四洲志》译稿交给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行为呢?

可以确定地认为:林则徐组织译编的《澳门新闻纸》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官方报纸;他的译编活动,是中国近代报纸出版活动的先声。因此,林则徐无愧为中国近代第一报人。

王 韬

(1828—1897)

王韬，原名王利宾，又名翰，字懒今。1828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塾师家庭。1862年他35岁时，方改名为王韬，字仲弢，又字子潜、紫诠。

王韬祖上为明朝望族，族人多有在朝为官者。明末，其先辈在江南抗击清军，几乎全家殉难，从而家势衰颓，移居吴县。王韬自幼得其家学熏陶，聪慧勤学，但“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17岁考取秀才，次年赴南京乡试不中，加之家境贫寒，父亲早丧，只得弃学谋生。

1849年，22岁的王韬离开乡里，来到上海，进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办的墨海书馆担任编译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到1861年因病辞离，其间一面与麦都思、艾约瑟等教士合译圣经等西方书籍出版，一面教授这些教士学习中文。经他参加翻译、编辑出版的著作有《格致西学提要》、《瀛寰杂志》等。这一时期，王韬为生计奔波于国内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有所接触和了解，又面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深为国家民族命运浩叹，“每酒酣耳热，抵掌雄谈，往往声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数行下”。

1862年，李秀成率太平军二次进攻上海。王韬当时正在家乡，他化名黄畹，向太平军驻苏州长官呈了《上苏福省总理民务逢

天义刘秉钧书》，建议太平军：缓攻上海，以换取外国不资助清朝军火的承诺；力争长江上游，北图中原。不久，清军攻破太平军据点，缴获此上书，并查明系王韬所为，李鸿章遂下令以“通贼”罪缉捕他。王韬闻讯即潜回上海，在英国领事幕西士庇护下，于密室内闭居百余日，后又转移到香港的英华书院，帮助英国人理雅各等翻译中国古籍，从此改名为韬，号天南遁叟。

1868年，王韬应理雅各之请，同赴英国，继续帮助他翻译中国书籍，历时3年，译成《诗经》、《尚书》、《春秋左传》三经。其间，他游历了日本、法国、俄国。这一段经历，确实是颠沛流离，但也使他眼界大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王韬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新的飞跃，开始确立“变法自强”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张。

1870年，王韬返回香港，他不再满足于编译工作，而是动笔撰文，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当时，他与朋友黄平甫主要为《华字日报》撰稿，不久即成为该报主笔。他编译的《普法战纪》也在该报连载，引起时人注意。当时，《申报》在介绍《华字日报》的文章中，曾特别提到：“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即王韬——笔者），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不第供夫乾臚志夫虞初而已也。”

不久，英华书院停办，王韬便与黄平甫集股买下该书院，改名为“中华印务总局”，专营印刷业务，并以此为基础筹备办报。

1874年1月5日，王韬任主编的《循环日报》创刊。该报新闻部分用白报纸印刷，占三分之一篇幅（其余篇幅为用土纸印刷的船期信息），分三栏，一为“京报选录”，一为“羊城新闻”，一为“中外新闻”。每月又另选重要新闻和评论，汇编成月报一册，单独发行。

《循环日报》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每天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一篇政论文章。这些政论文章大都出于王韬手笔,王韬也因善写政论而名噪当时。他的政论文章写得深入浅出,言之有物,雄辨而有感情,既继承我国古代杰出政论家的优良传统,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政论主要是系统宣传自己的政治改良主张。

《循环日报》在国内及东南亚一带曾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韬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政论作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他主编的《循环日报》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刊。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后来整理成《弢园文录外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

1884年,王韬终于在李鸿章默许下,得以回归故乡,并在上海《申报》担任编纂主任。1885年,创办弢园书局。1888年,被推举为格致书院山长。1894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由广东赴天津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曾托王韬为其润色那篇著名的《上李鸿章书》。王韬同时还写信给洋务派官员盛宣怀等,为孙中山上书疏通门径。

1897年,王韬病逝于上海。

王韬的一生,主要是从事编辑出版活动。其编辑生涯,大至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49年至1861年;第二阶段为1862年至1884年。

在第一阶段,王韬从一个出身封建地主阶级家庭,受过浓重的儒学教育而又贫困无计的年轻学子,为谋生计而步入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上海,进入外国人开办的《字林西报》附设的中文书局——墨海印书局,与洋教士们共事,并一干就是13年。在这里,王韬通过编辑、翻译西方著作,以及前往英国,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政治有了一些接触和了解,对中国朝廷腐败、国势衰微、民生凋敝的现状有了较深的感触,心中深深地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他也曾多次向清政府上书建言,提出“御

戊”、“平贼”方略,但还是出于封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还是囿于维护封建统治,其思想也还没有跳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框框。在学术上,他仍然倾心于出来谋生前就已颇具功力的诗和春秋左传二经。所以,这一阶段,王韬的编辑活动主要是为了糊口,是不自觉的介绍西方文化。但由于他从事编辑活动的场所和编辑活动的对象都与西方思想文化有直接关联,这就为他日后更进一步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在编辑活动中自觉地提出改良主张,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阶段,作为清政府缉捕的对象,王韬不得不在外国友人的庇护下颠沛求生。特别是从1868年到1870年的3年间,他先后旅居、游历英、法、日、俄诸国,尽管对这段飘零身世感慨万分、唏嘘不已:“孤身往还数万里,尝登舵楼以眺望,决目极天,荡胸无际,波涛消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未尝不感怆身世,悲悯天人,击碎唾壶,泪涔涔坠。”却得以持比较冷静的态度,深入考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览其山川,察其民俗,识其国势,稔其兵力,探其富国强兵之奥秘。通过这几年的异国生活,王韬的思想起了深刻变化,产生了重大飞跃,认识到中国非改变现状不足以图存,形成了“变法图强”的政治思想,和比较系统的政治改良主张。

此外,王韬与当时颇知洋务的丁日昌、容闳以及黄遵宪等人也有较多交往,这从另一个方面对他的思想的变化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

自1870年返回香港后,王韬一面为《华字日报》撰稿,一面积极筹备创办自己的报纸,准备把自己的思想认识传播给国人。《循环日报》的创办,成为王韬等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改良人士宣传自己政治思想观点的重要讲台。

从1874年到1883年,王韬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循环日报》的工作上。他自己作为主笔,用“遁窟废民”、“天南遁叟”、“欧西寓公”等笔名,发表了一批政论文章。这些文章中,有的是全面

系统地宣传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如《变法》、《变法自强》、《重民》、《洋务》、《答强弱论》、《强弱论》等;有的是具体陈述变法主张的,如《治中》、《睦邻》、《除弊》、《兴利》、《尚简》、《遣使》、《使才》、《达民情》、《练水师》、《设电线》、《建铁路》等;有的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如《原道》、《原学》、《原人》等;有的是抨击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活动的,如《俄人志在并兼》、《西人重日轻华》、《琉球向归日本辩》、《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保远民》、《越南通商御侮说》、《宜索归澳门议》、《亚洲半属欧人》等;还有的是介绍西方各国政治、军事等情况的,如《欧洲将有变局》、《纪英国政治》、《英重防俄》、《西国兵额日增》、《各国教门说》、《欧洲近日不轻用兵》等。

王韬的政论中,突出地强调中国要求“变”。他认为:在当时资本主义列强向全世界拓展势力的大势之下,中国正面临着“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过去的一套统治办法已难以维持,“动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迁,则我中国当自承其弊。”他指出:“道贵乎固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而西方“诸国并以大海为门户,轮舟所指,百日可遍于地球,”“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泰西诸国之群集而环伺我者,有迫之以不及不然之势也。”“设我中国至此时不一

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其求变、思变之心，可谓至诚至切矣！

王韬明确其所以要求变法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所谓强中以驳外”。他指出：“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以中国之大而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其后当未可限量，泰西各国固谁得而颉颃之。”他认为：即使在当今列强环伺的严峻局势下，“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一变而已矣。”因此，他强调：“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变法自强，驭外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王韬的思路是：变法可以使中国强大，中国强大即可立于世界强国之地位，与西方列强抗衡。所以他很重视这个“强中驭外”的命题，提出：“凡泰西诸国之所耽耽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覬觎艳羨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

王韬关于变法的具体主张是：向西方学习。他指出：“当今之世，非引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在他的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包括准许民间广开矿山工厂，自立公司，建立电话通讯，修筑铁路交通，扩展对外通商，撤销厘税制度，改变重农抑商传统，等等。“辟车路以通平陆，设电线以建邮传，开矿务以采煤铁五金，铸钱圆以使商民足国用，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实营伍赡额兵，制机器以兴织造，许民间用轮船以达内河，立公司以贸易于外洋。”这些“厚其生”、“恒其业”、“利皆公之于民”的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比起洋务派官僚买办来，又更前进了一步。他还强调，学习西方不能“仅袭皮毛，而即嚚然自以为是，又皆因循苟且，饰雍其容，终不能一旦臻臻于自强。”